

美国全球化叙事：历史、逻辑与困境^{*}

任志锋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当前美国的逆全球化是其全球化叙事逻辑及其困境的必然产物。美国全球化叙事根植于基督教和启蒙运动共同构筑的国家精神，服务于资本增殖扩张的社会制度与称霸全球的战略意图，其历史观念、逻辑结构、价值取向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并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霸权困境、安全困境和国内政治经济困境。对此，我们既要做好战略应对，又要抓住历史机遇，用中国方案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逆全球化 全球化叙事 美国

作者简介：任志锋（1984-），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吉林长春 130024）。

当前，反对自由贸易、鼓吹贸易保护主义的逆全球化思潮在美国强势崛起。关于美国逆全球化的原因，国际舆论大多是从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日渐高涨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治国理念和对外贸易的严重失衡等角度展开分析，鲜有从历史文化根源进行探讨。事实上，逆全球化现象在美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贯穿了美国由弱到强、由强到霸的整个过程。对于这样一种反复发生的历史现象，仅是分析其具体成因是不够的，还须深入美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禀赋探究其内在的必然性。当前美国的逆全球化与其根深蒂固的国家精神和全球观念紧密相关，是美国全球化叙事逻辑及其困境的必然产物。本文拟从历史文化视角研究分析美国逆全球化，试图揭示美国全球战略的本质、特点与规律，为我国制定应对方略提供参考。

一、美国全球化叙事的历史回顾

从发生学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是近代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开拓的历史产物，是资产阶级取代封建所有制关系并最终确立起自身统治地位的重要力量，用马克思的话说：“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①就美国而言，它“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从属于这个社会的生产”^②，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卷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可谓“因经济全球化而生、因经济全球化而兴、因经济全球化而霸”，是个名副其实的“全球化国家”。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前提问题，更是其构筑统一的民族国家身份的关键所在。正因为此，美国历届政府无不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作为施政的重要议题，并围绕这一议题讲述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思想研究”（17CKS032）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

了一系列具有美国特质和时代特征的全球化故事。这就是所谓“美国式的全球化叙事”。

1. “山巅之城”：从孤立主义到海外扩张的全球化叙事

“山巅之城”是美国讲述的第一个全球化故事，其历史跨度大体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的在于巩固壮大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主要情节是从“不卷入欧洲事务”到“美洲事务自主”和“亚洲门户开放”。

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是个人口较少、国土狭小、综合国力不强、国际影响微乎其微的农业国。基于对欧洲列强的忌惮和自身贫弱的现实，美国的建国者们对内宣称要构建代表人类未来的“山巅之城”，对外秉持“不卷入欧洲事务”的国策。这种现实主义、孤立主义的全球战略，却被托马斯·潘恩、华盛顿、汉密尔顿冠以避免“山巅之城”与旧世界“同流合污”，“避免旧世界的腐败堕落侵蚀美国人高尚的德性”，“避免外国势力的阴谋威胁美国先进的共和试验”之名。19世纪20年代，随着美国对拉丁美洲的不断扩张，“山巅之城”的范围开始覆盖整个美洲大陆，于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与“遏制欧洲专制主义扩张”成为美国对抗欧洲神圣同盟的道义基础。到了19世纪末，为扩大海外市场，美国与西班牙私相授受菲律宾主权，出兵镇压菲律宾起义军，还伙同欧洲列强瓜分中国，倡导“门户开放政策”。然而在“山巅之城”的故事中，美镇压义和团运动、入侵北京也被描述成“救援”和“远征”^①。

2. “自由世界领袖”：从“道义领导”到“称霸世界”的全球化叙事

如果说“山巅之城”是美国霸权梦想的初步显现，那么“自由世界领袖”则全面昭示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意图。这个故事讲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时期，目的在于谋求世界霸权，主要情节是从“民主殿堂”到“救世主”与“和平砥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为了既不承担国际责任又能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美国以“道义领袖”自居，讲述了一个“民主殿堂”的故事。时任美国总统的沃伦·哈定曾坦承，美国最恰当的角色不是卷入“旧世界的事务”，而是“谋求文明世界的道德领导力”，成为“代议制民主不可撼动的圣殿”^②。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这种“骑墙”式的投机战略始终主导着美国的对外政策，直至日本偷袭珍珠港，才被彻底击垮。自此美国开始想象和讲述所谓的“救世主”故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让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的声望空前高涨。但环视世界，一个新生的与西方政治制度和战略利益相互抵牾的社会主义阵营，让美国惴惴不安，于是便有了所谓“和平砥柱”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美国一面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描述为“罪恶帝国”和“发生一切动乱的根源”，一面将自己塑造成“世界和平的压舱石”。1947年3月，杜鲁门在国会特别咨文中呼吁美国人承担起与共产主义国家作战的领导责任，他说：“形势的急剧变化已经把伟大的责任放在我们的肩上”，“如果我们在承担领导责任方面动摇胆怯，我们可能危害世界的和平，而且也肯定会危害我们自己国家的福祉”^③。

① 笔者亲眼目见，在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Somerville)的公立图书馆门口，矗立着一块“烈士纪念碑”。碑的正文写道：“纪念那些在陆地和海上同西班牙作战，在菲律宾起义和中国救援远征中牺牲的萨默维尔志愿军”(In honor of the volunteers from Somerville who served on land and sea in the war with Spain, the Philippine Insurrection and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 1889-1902)。这里的“中国救援远征”即是指美国以保护本国侨民镇压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进北京。

② Warren Harding, “Inaugural Address”,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eds.), *Inaugural Addresse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George Washington to Lyndon B. Johnson*,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65, p. 232, pp. 233-234.

③ Harry S. Truman, “Address to Congress”, Henry S. Commager(ed.),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3, p. 528.

3. “美国治下和平”：将“单极时刻”固化为“单极时代”的全球化叙事

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进入所谓“单极时刻”。如何将“单极时刻”固化为“单极时代”，确保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成为美国全球化叙事新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便有了“美国治下和平”^①的故事，其情节经历了从“战争与和平”到“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演变。

为捍卫世界霸权，从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到1995年、1999年两次武装干预巴尔干地区，再到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2011年参与利比亚战争，美国全球化的战争叙事足足延续了20年。作为战争叙事的补充，和平叙事是以“全球化”的名义进行的。这一时期美国极力推进“全球一体化”，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断言，“只有短视的、愚蠢的或毫无准备的人才会反对全球化”^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美国倒着实成了弗里德曼指责的对象，这就是特朗普的逆全球化叙事。在特朗普的叙事结构中美国扮演着两种相互矛盾的角色，即“全球化的受害者”与“西方文明的守护神”。前一种角色的叙事意义在于将美国国内问题归因为“国际贸易秩序不均衡”与“少数汇率操纵国的阴谋”，这就是特朗普调动民粹情绪、赢得大选的叙事技巧；后一种角色的叙事意义在于将美国的衰落描述为“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威胁”，这也是2017年7月特朗普在波兰呼吁“保卫西方文明”的叙事动因。

回顾历史，美国全球化叙事从来都不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呈现，而是一种基于国家利益的“目的化”“情节化”的自我想象。因为有了“目的”，经济全球化被“挑选”“重组”成“新的整体”；因为有了“情节”，这个“新的整体”便有了前后相继的时间序列。于是作为客观历史进程的经济全球化被讲述成了一系列具有主观目的性、结构整体性和时间连续性的“美国故事”。这些故事归结起来就是：上帝选民如何建立山巅之城，山巅之城如何照耀引领世界。这就是美国全球化叙事的历史主题和内在逻辑。

二、美国全球化叙事的逻辑结构

美国全球化叙事的逻辑包括“基本序列”与“复合序列”两部分。其中“基本序列”是根基，是用于描述“上帝选民”与“山巅之城”的故事母本，规定美国全球化叙事的基本观念、价值尺度和实践原则，此为逻辑主线。“复合序列”是“基本序列”的展开，用于描述人类故事、他者故事与美国故事的关系，为故事母本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提供辩护，此为逻辑副线。在“基本序列”与“复合序列”的共同作用下，“上帝选民”与“山巅之城”的故事成为美国确证自我、观察世界的认识基础及其全球战略制定调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1. 美国全球化叙事逻辑的基本序列

在基本序列上，美国全球化叙事主要指向“如何看待全球化发展”“如何权衡全球化策略”“如何达成全球化目的”三大问题，相应地形成了认识、价值与实践三重逻辑。

第一，自我与他者分野的认识逻辑。与马克思主义将国家视为社会发展与阶级斗争的产物不

^① “美国治下和平”的提法最早见于2002年9月20日布什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但事实上，它是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全球战略的指导思想，只是具体表述略有不同。老布什政府称之为“世界新秩序”，克林顿政府称之为“接触与扩展”，奥巴马政府则将其具体化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巧实力”和“不干蠢事”原则。

^② [美] 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赵绍棣、黄其祥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同^①，美国将自我与他者的分野当作民族国家产生的基础。这种分野不仅在于疆域、籍贯、语言、国别、社会制度等硬性因素，更在于对自我与他者的想象。对自我的想象意在确立国家的统一性，对他者的想象意在确立本国与他国的差异性。以此为基础，美国式的国家想象突出自我的优越性和他者的落后性，更加强调自我与他者的矛盾冲突。自“五月花”号抵达美洲大陆之后，清教徒们便把世界划分为“新”“旧”两个部分；美洲大陆这块“新世界”代表着光明和自由，其居民是“上帝的选民”和“我们时代的以色列人”；而清教徒们被迫离开的欧洲则是所谓的“旧世界”，是落后、堕落、腐败、专制的代名词。后来，随着美国介入全球事务的深度和广度的发展，“他者”的内涵也在不断调整。在“山巅之城”的叙事中，他者指的是欧洲列强和“待解放”的殖民地人民。在“自由世界领袖”叙事中，他者先是指法西斯，后又指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到了“美国治下和平”时期，他者指代的范围则更加宽泛，既包括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也包括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还包括不愿听从指挥的盟友，简直覆盖了整个世界。可见，将自我与他者截然对立，是美国全球化叙事最为根本的观念基础。由此出发，美国既在寻求盟友，也在制造敌人；既对自我的优越性抱以宗教般的信仰，又对其霸权地位充满深深的焦虑^②。

第二，理想与实用同构的价值逻辑。美国的立国精神源于基督教与启蒙运动两大传统。其中，基督教的弥赛亚传说使美国人向来以“上帝选民”自居，将“新世界”看作上帝赐予的“充满希望的土地”，梦想着用“山巅之城”引领世界，用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救赎”世界各地的“受苦受难者”。这种带有基督教“救世”色彩的理想主义是美国全球化叙事中极为重要的价值逻辑，也是美国为其全球战略辩护、动员国内舆论支持全球政策的重要精神资源。此外，启蒙运动从另一个维度对美国全球化叙事产生影响：一方面，启蒙运动所创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最早在美国变成了现实，这一历史事实强化了美国人“上帝选民”与“山巅之城”的国家想象；另一方面，启蒙运动所承接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在美国转化为实用主义的国家精神，成为美国国际行为选择的重要价值尺度。在全球化的叙事中，这种实用主义价值取向直指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运用各种测算工具推演国际局势、计量收益成本，最终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形成相应的战略举措，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总之，理想主义重在塑造美国全球化叙事的道义形象，赋予美国全球战略以“十字军东征”式的道德使命感，从而为实用主义叙事提供正当性包装；实用主义重在从全球化进程中谋取实际利益，形成“美国利益至上”的战略自觉，从而为理想主义叙事奠定现实基础；二者共同构成美国全球化叙事的主导性价值取向。

第三，孤立与扩张兼用的实践逻辑。孤立与扩张是美国全球化叙事的两种相互交织的实践逻辑。在“山巅之城”的叙事中，美国坚持“不卷入欧洲事务”的国策，对欧洲国家间的纷争持“中立态度”，与此同时通过所谓“传教士外交”，在欧洲列强无暇他顾的其他区域（拉丁美洲和东亚）跑马圈地、扩大势力范围。在“自由世界领袖”的叙事中，美国积极开展对外扩张，同时将孤立对象转向了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意识形态污名化、贸易隔绝、军事封锁等方式，企图将社会主义阵营“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到了“美国治下和平”时期，扩张成为美国全球化叙事的主导逻辑，其对象不仅包括西方文明的“化外之域”，还泛指涉自己的盟国，前者表现为美国长达20年的武装征伐，后者表现为对盟国的高度不信任，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对日本、韩国、欧盟总部和欧盟驻华华盛顿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7页。

② 参见孔祥永：《“他者想象”与美国的焦虑》，《美国研究》2015年第4期。

使团等进行监控窃听。当前，美国全球化叙事的孤立对象逐步转向了中国，企图通过“人权”“民主”“自由”等议题，将中国塑造成“完全异己”的对象，从而为遏制封锁中国提供意识形态依据。可见，在美国全球化叙事的历史演变中，孤立与扩张是两种不可分割的实践逻辑，二者的此消彼长取决于美国国家实力与战略利益。

2. 美国全球化叙事逻辑的复合序列

在基本序列基础上，复合序列围绕“人类故事与美国故事的关系”“他者故事与美国故事的关系”等问题，形成了两种叙事逻辑。

其一，“人类历史向美国演化”的直线式逻辑。建立于基督教与启蒙思想基础之上的美国精神，将人类历史看作一个自然演化的直线过程，并将演化的地理轨迹描述为从欧洲到美洲，再从美洲辐射全世界的“中心—边缘”模式；同时将美国精神的文化血脉向上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和启蒙运动，向下延伸成所谓的“普世价值”。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直线进化的历史想象开始于美国的殖民地时代。1630年，刚刚移居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领袖约翰·温思洛普（John Winthrop）就宣称，在新大陆上建立为万众所瞻仰的“山巅之城”是“神赐”机缘，如若失败神便会收回对清教徒的庇护，使他们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华盛顿的就职演说也充满了类似的历史想象，他说：“人们经过深思熟虑，最后确定把自由圣火的保存和共和政府的命运，寄托在交付于美国人民之手而进行的试验之上。”^①

如果说早期建国者们的历史想象还带有某些神秘色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则开始为之逐步注入实质性内涵。威尔逊承接华盛顿的思路，将民主共和视为“人类历史向美国演化”的重要标志，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民主不再是一个试验”，而是切实可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模式。杜鲁门则将“领导世界”当作历史的必然，他说：“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我们赢得的胜利已经把领导世界的持续重担放到了美国人民身上。”^②这种直线式逻辑一直延续到今天。2014年，面对滚滚而来的“美国衰落论”，奥巴马坚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强国，过去这个世纪如此，下个世纪依然如此。”^③

其二，“异己者阻碍人类历史演化”的镶嵌式逻辑。既然“人类历史向美国演化”是必然的，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与美国精神和制度设施相异的国家或民族，则逻辑性地成为美国眼中的“反动力量”，“不和谐”地镶嵌在“美国领导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而“上帝选民”的使命就在于发现并剔除“异己者”，扫清“历史演化”的道路。这种镶嵌式逻辑使美国全球化叙事总是伴随着对“异己者”的指认，并通过描述“异己者”的“倒行逆施”，为美国全球政策提供道义和法理上的支撑。

早期殖民者将印第安人视为异己的力量，将他们描述成“野蛮人”和“魔鬼撒旦的使者”，将对印第安人的杀戮美化为“耶稣基督福音的传播”。独立战争时期建国者们将欧洲视为异己者，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甚至把整个英国的历史都斥为“怙恶不悛、倒行逆施的历史”，而将英国殖

① “George Washington’s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Inaugural Addresse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George Washington to Bill Clinton*, Champaign: Project Gutenberg, p.2.

② Harry S. Truman,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Recommen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part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2259>.

③ Barack Hussein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Commencement Ceremony”,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4/05/28/remarks-president-united-states-military-academy-commencement-ceremony>.

民政策描述为“在我们各州建立一种绝对专制的统治”^①。冷战时期，美国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看作异己者，指责他们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极其不和谐”的片段并终将被美国所代替，用里根的话说：“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悲惨的、匪夷所思的篇章，即使今天这一篇章的最后挽歌仍在被继续书写着”，但是美国“终将战胜那些奴役自己同胞的人”^②。今天的美国又将中国视为“异己者”与“美国治下和平”的威胁，所以在美国的全球化叙事中，中国总是“不守规矩”“肆意妄为”，中国建设发展的成就越大，美国由此所产生的焦虑和忌惮就会越深。

三、美国全球化叙事的深层困境

综上所述，美国全球化叙事是基督教信仰、启蒙精神与国家利益混合而成的产物。这种基于唯心史观的国家想象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属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③，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实践证明，美国为了一己之私对经济全球化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叙事策略，不但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相反却加剧了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生性矛盾。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最具革命性和进步性的价值，莫过于使人类得以跳出狭隘封闭的时空界限与零和博弈的强权政治怪圈，转而投入更富多元性、流动性和交互性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不可能是少数国家自我意志的普遍化，只能是绝大多数历史主体共商共建的结果，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说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④这与美国“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霸权主义叙事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历史观念与价值取向的巨大矛盾，使美国全球化叙事陷入难以逾越的困境。

1. 天命观念与美国霸权重负

假借基督教信仰以确认自身的优越性及其对外扩张与称霸世界的正当性，是美国全球化叙事最为典型的思维传统。这种天命论的思维传统历经领土扩张（19世纪中叶）到干预主义（20世纪之后）的演变，成为美国称霸全球的观念基础。

从天命观念出发，美国不断加强对世界事务的管控和他国内政的干预，着力谋求全球霸主地位，同时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单是从经济上看，为维持世界霸权和支付巨额军费，美国财政常年入不敷出，只能靠举借外债来维持运营。到2016年9月底，美国政府累计国债已达19.7万亿美元，债务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竟达106%，远远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目前美国政府、公司和私人累计欠债总额高达200万亿美元左右，按照3.05亿人口计算，人均欠债约为70万美元，每个家庭（按每户3.1人）欠债217万美元，一半以上州政府理论上已经破产”^⑤。面对巨额国债，美国只能依靠增发货币和量化宽松政策减轻债务压力，可是如此

① Thomas Jefferson, “A Declaration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General Congress Assembled”, <https://www.wdl.org/en/item/109/view/1/1/>.

② “President Reagan’s ‘Evil Empire’ Speech to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http://chmn.gmu.edu/1989/items/show/64>.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

⑤ 林海虹、田文林：《金融资本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3期。

一来美元就会大幅贬值，美国国家信誉就会遭到重创，从而使美国背负沉重的道义负担，甚至动摇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事实上，美国政府近年来主动推进美元贬值已成公开的秘密。据测算，“1971年，35美元能够兑换1盎司黄金；2016年，1300多美元才能购买1盎司黄金”^①。通过如此巨大的贬值幅度，美国“成功”劫掠了世界财富，但也深刻动摇了人们对美元主导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信心。仅2016年1月至9月，各国抛售美国国债就达3931亿美元，创下197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②。可见，天命观念所勾勒的霸权梦想不但没有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繁荣和稳定，相反成了美国衰落和世界动乱的主要根源。

2. 他者想象与美国安全焦虑

在天命观念基础上，美国全球化叙事炮制出“正义的我们”与“邪恶的他者”两种势不两立的对抗力量。其中，“我们”是“民主自由的化身”，代表着“光明”和“正义”，“他者”是“专制独裁的代言人”，象征着“黑暗”与“邪恶”。因“上帝的旨意”而居于“世界中心”的“我们”，时刻面临着“他者”从“边缘”发起的攻击和挑战。由此，“如何保卫山巅之城的绝对安全”，便成为美国全球化叙事的核心话题。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③事实证明，美国这种两极对立式叙事逻辑，不但没有实现所谓的“绝对安全”，相反却使之陷入深深的安全焦虑之中。为此美国不断扩大安全议题，除传统战争形式之外，还包括恐怖主义、“失败国家”“人道主义灾难”等低烈度、准战争形式，同时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国家安全体制，设立中央情报局、国土安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等一系列专门机构，用以处理纷繁复杂的安全问题。

此外，对外发动战争也是美国寻求绝对安全、克服安全焦虑的重要方式。据统计，在美国独立以来的240多年时间里，有222年都处于战争状态，占整个美国历史的93%^④。无休无止的战争没有给民众带来丝毫好处，而只是“以牺牲纳税人的代价富裕了少数军火集团”。从民众生活来看，“美国军事帝国扩张的每月消耗超过150亿美元（平均每小时2000万美元），五角大楼花在战争上的费用比全美50个州用于卫生、教育、福利和社会保障上的资金总额都要多”^⑤。而2014年摩根斯坦利的报告表明^⑥，过去50年间美国军工集团的股票市值增值了27699%，其他行业股票仅增值了6777%，二者相差达4.1倍之多；单是2010—2013年，雷神公司（Raytheon）就为其投资者创造了124%的回报率，诺斯洛普·格鲁曼（Northrup Grumman）的回报率为114%，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回报率为149%。可见，基于他者想象的安全焦虑正在给美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压力和社会矛盾。

3. 资本宰制与美国两难选择

以天命观念和他者想象为“掩护”，美国全球化叙事极力遮掩和美化其真实的战略意图，即寻求资本的增殖和扩张。马克思曾引用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一书的话指出：“资本害怕没有

① 周世俭：《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加剧》，《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1日。

② 参见周世俭：《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加剧》，《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1日。

③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④ 林海虹、田文林：《金融资本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3期。

⑤ John W. Whitehead, “The Path to Total Dictatorship: America’s Shadow Government and Its Silent Coup”, https://www.rutherford.org/publications_resources/john_whiteheads_commentary/the_path_to_total_dictatorship_americas_shadow_government_and_its_sile.

⑥ James Petras, “The Soaring Profits of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http://dissidentvoice.org/2014/06/the-soaring-profits-of-the-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identifier_0_54752.

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① 为最大限度获取利润，资本无孔不入地侵入美国政府机构、经济领域和媒体舆论，成为美国全球化叙事的“宰制力量”。“资本利益最大化”取代“国家利益最大化”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原则，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扩张和经济掠夺充当了资本寻求更高回报率的工具。

伴随资本的增殖和扩张，美国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中产阶级迅速萎缩，社会陷入深度撕裂。在此情况下，政治精英面临着“钞票”与“选票”的两难选择。一方面，美国选举制度对资本的高度依赖，使政治精英不敢贸然开罪财团力量，甚至还要唯财团之命是从。《纽约时报》2015年10月10日报道称，美国已经被158个分布在能源、金融领域的家族和企业所控制，他们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提供了近一半的资金支持^②。另一方面，考虑到选票，政治精英又不敢无视拥有投票权的民众，甚至还要迎合他们对资本寡头的不满情绪。如此一来，“出尔反尔”便成为政治精英惯用伎俩。例如，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激烈抨击金融寡头及其所支持的政客，借以批评全球化。他说：“全球化使那些向政客们捐赠的金融精英们变得非常富有。但是它让我们数百万的工人除了贫穷和心痛之外一无所获。”^③ 然而他就任总统后所组建的内阁几乎就是个“亿万富豪俱乐部”，金融资本家占据商务部长、财政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要职。政治精英的言而无信使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一降再降。皮尤中心的调查表明，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民众信任率仅有19%，而这一数据在1958年却高达77%，同比下降了58个百分点^④。

四、结 语

美国全球化叙事根植于基督教和启蒙运动共同构筑的国家精神，服务于资本增殖扩张的社会制度与称霸全球的战略意图，其历史观念、逻辑结构、价值取向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并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霸权困境、安全困境和国内政治经济困境。

当前美国逆全球化是其全球化叙事逻辑及困境的必然产物。首先，逆全球化延续了美国全球化叙事的历史传统。根深蒂固的天命观念使美国在对外部世界时往往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或对外扩张以称霸天下，或退守孤立以保全自身。当前的逆全球化是美国孤立主义叙事传统的“有限回潮”，是在坚持“称霸天下”基础上的自我保全之策。其次，逆全球化没有改变美国全球化叙事的称霸主题。特朗普政府几乎退出和调整了全部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转向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在军事上却表现出更加强烈的进攻态势，强调“军事优先是美国优先的基础”，扬言要打造“人类史上最强大军队”，其霸权主义企图昭然若揭。最后，逆全球化是美国全球化叙事矛盾的集中爆发。由资本主宰的美国全球化叙事始终面临着精英与大众、钞票与选票的矛盾。《时代》杂志在分析特朗普胜选的原因时就指出：“这些年他以无礼的方式抓住了大多数小报的头条，并借此与普通民众建立了联系”，“他清楚地知道触发美国选举的核心问题，并说服多数民众相信他是启动改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

② Nicholas Confessore, Sarah Cohen and Karen Yourish, “The Families Funding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5/10/11/us/politics/2016-presidential-election-super-pac-donors.html>.

③ “Donald Trump’s Jobs Plan Speech”, <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6/06/full-transcript-trump-job-plan-speech-224891>.

④ “Beyond Distrust: How Americans View Their Government”,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5/11/23/beyond-distrust-how-americans-view-their-government/>.

的最佳人选。这个问题就是：“全球化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工作机会盗窃者”^①。这种极具煽动性的口号迎合了“铁锈一带”蓝领工人和中西部农民的需要，也是特朗普意外当选的重要原因。事实上，特朗普之所以鼓吹逆全球化是为了在“钞票”与“选票”的两难选择中走出“第三条道路”，即依靠“钞票”控制非主流媒体，再经由非主流媒体抨击所谓的“政治正确”，最终获取主流媒体视阈之外的多数民众的“选票”。

总之，美国全球化叙事的历史传统、逻辑结构和深层困境，塑造和规制着美国全球战略的制定和调整，是美国认识和处理经济全球化问题的文化心理基础。反过来，美国基于自身国家实力状况和战略利益，在不同历史时期采取的“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经济全球化政策，进一步固化了其全球化叙事的文化心理模式。当前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就是这种文化心理模式面对美国全球性霸权衰落、内生性制度病症、系统性经济困难和深层性社会撕裂作出的必然反应。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②。因此，无论美国采取什么样的逆全球化策略，都无法改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经济格局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大势，对此我们应充满信心，努力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引领者。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美国的逆全球化既有短期目的也有长远考量，既有现实原因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美国只要不能战胜其全球化叙事的根本缺陷，就无法走出其面临的深层困境，而只能诉诸日趋强烈的逆全球化，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充分估计逆全球化可能引发的摩擦和冲突，特别是要警惕美国假借贸易保护主义之名对我国实施战略遏制，有针对性地做好政策应对。更为关键的是，经济全球化本就是一把“双刃剑”，再加上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其不公正不合理性十分明显，从而更加剧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当前世界范围内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种种非议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负面效应的具体反映。对此我们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扎实做好对外宣传和理论阐释，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公正共赢”^③的方向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 [3]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
- [5] 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编辑：刘影）

① Michael Scherer, “The Person of The Year”, <http://time.com/time-person-of-the-year-2016-donald-trump/?iid=toc>.

②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③ 习近平：《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谋求亚太更大发展——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1日。